歌承土家·舞润荆楚
——舞台艺术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评论

孙晓娟
湖北省土家族（五峰）歌舞剧团，湖北 宜昌 443413
DOI:10.61369/HASS.2026060032

摘　　要： 民族舞台艺术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是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命题。本文以《古道茶人》《茶山七仙女》等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作品为对象，从价值引领、艺术转化、人民立场、品牌构建四个维度，探讨其在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这些作品以茶路叙事构建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表达，以民间歌舞的戏剧化转型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以乡土叙事与时代精神的共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地域符号的凝练打造了可识别的民族文艺品牌，为新时代民族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
关 键 词： 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古道茶人》；文化传承；共同体意识

Singing the Tujia Heritage, Dancing through Jingchu: A Review of Stage Art Creation and Ethnic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Sun Xiaojuan
Hubei Tujia (Wufeng) Song and Dance Troupe, Yichang, Hubei 443413

Abstract: How ethnic stage art can organically integrat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mains a significant pro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Taking Wufeng Tujia stage works such as The Ancient Tea Road and Seven Fairy Maidens of the Tea Mountain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ir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rom four dimensions: value guidanc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and brand constru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se works construct an artistic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rough tea-road narratives, achieve the living transmiss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dramatization of folk songs and dances, practice the people-centered creative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resonance of vernacular narratives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forge a recognizable ethnic artistic brand through the refine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ereby offering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thnic stage ar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Wufeng Tujia stage art; The Ancient Tea Road; cultural inheritanc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引言

在中华多民族艺术版图中，五峰土家族舞台创作以其鲜明的文化辨识度与持续的精品种植力，构成了一个值得深究的文艺现象。从撒叶儿嗬的质朴律动到《古道茶人》的恢弘建制，从山寨歌谣的口耳相传到专业舞台的聚光灯下，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走出了一条“歌承传统、舞应时代”的独特道路。

这条道路的核心命题在于：一个民族的民间艺术资源，如何完成从“文化遗产”到“舞台精品”的现代转化？这一转化又如何反过来激活文化认同、服务人民需求、参与民族对话？本文选取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作品为分析对象，试图从学理层面回应上述问题。不同于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作品的审美分析或单一院团的实践总结，本文致力于在个案深描与整体观照之间建立阐释框架，提炼具有普适意义的民族舞台艺术发展经验。

一、茶路叙事与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表达

民族舞台艺术承担着双重使命：既是审美创造，也是价值载体。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在处理这一关系时，找到了一个极具智慧的切入点——茶路叙事。

民族歌舞剧《古道茶人》的叙事架构值得细读。作品以“宜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签约制文学艺术创作扶持项目成果。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红茶”的百年流通史为经，以运茶马队的人物命运为纬，编织了一幅跨越地域、族群与阶层的恢弘画卷。剧中那条从鄂西深山蜿蜒而出、经渔洋关入长江、最终抵达欧洲的万里茶道，在舞台呈现中获得了超越地理的意义——它是一条物之路、人之途，更是一种文明对话的隐喻。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强调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有机整体[1]。《古道茶人》的艺术叙事恰恰为这一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感性注脚：五峰的茶叶经由汉阳商贾的加工远销异邦，茶农与商人、山民与市民、本土与异域，在“茶”的流转中结成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

剧中洛巴老汉的牺牲是理解这一叙事的密钥。他为救茶庄少东家强生而坠崖，表面看是一个偶然事件，深层却承载着结构性的象征意义——土家茶农与汉族商贾之间超越了利益交换，升华为生死相托的情感联结。这种联结的艺术表达，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路径。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要“从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等多维度协同推进”[2]，《古道茶人》的茶路叙事恰恰同时激活了历史记忆（百年古道）、文化认同（宜红品牌）与情感纽带（洛巴与宫老板的情谊）三重维度。

与之形成互文的是山歌剧《茶山七仙女》。这部作品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竞赛，七位采茶姑娘日采百斤的壮举与给毛泽东主席寄茶的情节，把土家山乡的微观劳动与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勾连起来。这种叙事策略在民族题材创作中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没有将少数民族文化处理为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的“深山秘境”，而是将其有机嵌入国家叙事的整体框架，呈现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国家建设参与者、历史进程推动者的主体形象。这一取向呼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的重要论述[3]。

二、民间歌舞的戏剧化转型与非遗活态传承

土家族拥有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哭嫁歌的哀婉、摆手舞的豪迈、撒叶儿嗬的旷达、板凳龙的灵动、南曲的清雅，共同构成了辨识度极高的艺术基因库。然而，非遗的舞台化呈现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原封不动地搬演，往往因脱离原生语境而丧失感染力；过度改编，又可能消解其文化内核而沦为符号拼贴。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的探索，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民族歌舞剧《古道茶人》提出的核心创作理念是“以土家族自己的艺术语言讲述土家族的故事”。这里的关键词是“自己的艺术语言”——它既非对外来戏剧形式的简单套用，亦非对民间歌舞的博物馆式陈列，而是在戏剧情境中对传统艺术元素进行功能性重组。以剧中段落为例：传统撒叶儿嗬的旷达沉稳，被转化为洛巴老汉遇险的亡魂祭奠；南曲的娓娓道来衍化成日白侬的叙事旁白；土家山歌的婉转悠扬则被幻化为西兰与强生爱恋情长的内心独白。这些传统元素不再是独立展示的“才艺表演”，而是服务于人物塑造与情节推进的戏剧手段。

这种转化方式契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活态传承”的核心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遗保护的目标不是“保存”某种固化形态，而是确保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力”[4]。国内学者亦指出，非遗的舞台化实践应当追求“情境再造”而非“形态复制”，即在新的使用情境中激活传统元素的表达功能[5]。《古道茶人》的实践表明：当撒叶儿嗬不再是为跳而跳，而是洛巴老汉遇险后众人送别亡魂的身体修辞；当土家山歌不再是为唱而唱，而是男女主角内心情感的戏剧性外化——传统便在新的意义结构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同属这一探索谱系的还有《土家板凳龙》。这件作品将流传于五峰民间的板凳龙游艺提炼为舞台舞蹈，完成了一次从“民俗”到“艺术”的品相跃升。板凳龙原是乡民节庆中的自娱活动，其核心魅力在于即兴、互动与质朴的生命力。舞台化的难度在于：既要保留其民间基因的鲜活感，又要赋予其符合剧场审美的结构完整性与视觉冲击力。作品最终呈现的效果——摘得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类一等奖——说明这一转化获得了认可。其成功经验在于把握住了“提炼”的分寸：抽离了游艺的随意性而保留了其洒脱感，强化了队形编排而延续了其集体狂欢的气质。

三、乡土叙事中的人民立场与时代关切

文艺创作中“人民性”的落实，不在于题材选择上的“写人民”，而在于情感立场上的“与人民同心”。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在这方面的探索，体现为一种双重自觉：既自觉从乡土生活中汲取创作资源，又自觉以时代精神照亮乡土题材。

《茶山七仙女》的创作历程本身就是“源于生活”的典型案例。1958年五峰县小河公社七位姑娘日采茶叶百斤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最终催生了京剧《茶山七仙女》以及后来的舞剧、山歌剧版本。从生活原型到舞台形象，这中间的转化并非简单的照搬，而是一种萃取与升华——将七位姑娘个体的劳动经验，升华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劳动人民精神风貌的集体写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6]。《茶山七仙女》的创作实践印证了这一论断：七位采茶女的形象之所以能够跨越六十余年仍具感染力，正是因为她们超越了具体的个人，成为了勤劳、智慧、奋进的劳动者原型。

微型音乐剧《山花》则呈现了乡土叙事在新时代的新面向。主人公刘雪莲从985高校毕业、辞去省城工作、回到偏远山区任教的人生选择，折射出的是当代青年在个人发展与家国责任之间的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价值抉择。剧中“山花课堂”的创设，不仅是情节推进的关键节点，更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核心意象——它代表知识、理想与爱的种子如何在最需要的地方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关于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细节：多个不同民族的孩子争论哪个民族文化最有特色，刘雪莲老师由此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这一细节展开了当代少数民族地区一个真实而敏感的话题——文化认同的代际焦虑。作品并未回避这一问题，而是通过教师的教育智慧给出了艺术的解答：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在理解与对话中重新确认自己的民族根脉。

这些作品在“写什么”与“为谁写”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它们写的是茶农、马帮、采茶女、乡村教师——写的是大地上劳作与生活的人们；它们为的是让这些普通劳动者的故事被看见、被尊重、被铭记。这种立场，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具体体现[7]。同时，这些作品对乡土题材的处理并不停留在乡愁式的怀旧或田园诗般的粉饰，而是直面艰辛、牺牲与抉择，使作品在温暖基调中保有现实主义的锋芒。

四、地域文化符号的提炼与品牌构建

在文化产品日趋同质化的时代，民族舞台艺术如何确立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土家族的经验是：将地域文化资源凝练为具有辨识度和传播力的艺术符号，以持续的作品产出构建品牌矩阵。

“宜红茶”与“古茶道”是这一品牌战略中最为核心的文化符号。《古道茶人》的创作，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审视，完成了一次空间叙事——它将五峰茶山、渔洋关码头、长江航道、汉阳商埠直至欧亚大陆串联为一条清晰的文化线路。这一空间叙事与当下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富有张力的互文：历史上的万里茶道，构成了今日“一带一路”的深厚历史根基与文化合法性来源。有学者指出，“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类型，其核心价值在于呈现不同地域、族群之间的“对话与交流”[8]。《古道茶人》在舞台上复活的，正是这条线路上曾经繁荣的对话与交流。

围绕这一核心符号，一系列作品形成了互文与聚合效应。男子群舞《古道相思》从另一视角延续了茶路叙事，歌曲《我在茶乡等你来》则将茶文化从历史纵深转向当代邀约。这种作品集群的构建策略，类似于文学领域的“文学地理”或影视领域的“系列 IP”——通过持续的作品产出，不断丰富和强化同一文化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最终使“土家茶文化”成为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艺术品牌。当观众在不同作品中反复遇见“宜红茶”“古茶道”“渔洋关”等元素时，这些符号便逐渐沉淀为稳定的审美期待与文化记忆。

这种品牌构建的意义不止于艺术传播层面。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文化品牌的成功塑造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内容支撑。精品土家歌舞在柴埠溪景区的驻场演出，正是舞台艺术向旅游产品转化的有益尝试。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被学界视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9]。当舞台精品沉淀为文化品牌，当文化品牌赋能旅游产业，一条“创作—传播—转化—反哺”的良性循环便有了运转的可能。

五、民族舞台艺术精品的生成路径与理论启示

回溯上述作品的创作实践，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精品的诞生并非偶然，其中蕴含着若干可辨识的规律。

首先，对传统艺术资源的“基因级”提取，构成了创作的原点。撒叶儿嗬的沉雄力道、土家山歌的婉转情思、南曲的清雅内敛——这些民间形式之所以能在《古道茶人》等剧中重获生命，并非因为被整体搬上舞台，而是创作者从中离析出了最具戏剧潜能的“活性因子”，并将其重构成服务于人物与情节的表达语汇。这提醒我们，民族艺术资源的舞台化，要害不在于“像不像”原生态，而在于能否捕捉其精神内核并赋予新的功能。

进而，这些“基因”必须经过“情境再造”才能真正成活。单纯的歌舞展示不具有戏剧力量，只有当它们被嵌入具体的人物动机、冲突情境和情感高点时，才获得了叙事意义。这正如接受美学所揭示的：意义并非文本自带的固定物，而是在受众的参与和情境的激活中生成的[10]。非遗的舞台转化同样如此——老传统需要新语境来唤醒。当土家山歌不再是田间地头的即兴对唱，而成为男女主角爱恋情长的内心独白时，它与当代观众之间便建立了可通约的情感通道。

最终，所有艺术手段都指向“价值承载”。从《古道茶人》中茶路之上结成的命运与共，到《茶山七仙女》里劳动之美的集体颂赞，再到《山花》所传递的教育温情与认同自觉，这些作品在审美上各有追求，但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沦为空洞的感官消遣。它们始终将精神高度视为作品的脊梁，用可感的舞台形象传递着超越地域与族群的人文关怀。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三个环节并非单向的流水线，而是一个彼此渗透、螺旋推进的循环体。基因提炼的精度需要在情境再造中反复验证，情境再造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价值表达是否落地有声，而价值传播的回响又会反过来促使创作者重新审视基因提炼的方向。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精品正是在这种“提炼—再造—承载—反馈”的回环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六、结语

“歌承土家”承的是千年文脉，“舞润荆楚”润的是时代人心。本文通过对《古道茶人》《茶山七仙女》等作品的分析，呈现了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乡土与时代之间寻求创造性平衡的实践智慧。这些作品以茶路叙事铸牢共同体意识，以基因重组激活非遗资源，以人民立场书写时代精神，以品牌构建拓展传播空间，为民族舞台艺术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可资借鉴的样本。

当然，任何创作实践都处在未完成状态。从“高原”迈向“高峰”，五峰土家族舞台艺术仍需在人物塑造的复杂性、戏剧冲突的尖锐性、艺术语言的当代性等方面持续精进。但无论如何，它已经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在中华文化的艺术星河中，各民族艺术扎根于自身传统、面向着广阔时代，完全能够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这份光彩，既是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整体繁荣的生动注脚。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2] 郝时远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N]. 人民日报 ,2018-05-17.

[3] 习近平 .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17).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EB/OL].2003.https://www.unesco.org/

[5] 高丙中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中国属性 [J]. 文化遗产 ,2019(3).

[6] 毛泽东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M]// 毛泽东选集 : 第三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1.

[7] 习近平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5.

[8] 单霁翔 . 关注新型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的保护 [J]. 中国文化遗产 ,2006(5).

[9] 张朝枝 , 刘诗夏 . 文旅融合 : 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J]. 旅游学刊 ,2021(8).

[10] 汉斯・罗伯特・姚斯 . 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M]. 顾建光等译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